

“活记忆”与“死记忆”

——钱锺书记忆研究的中式范例

刘保云

内容提要 1957年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一书中提出“活记忆”与“死记忆”之说，从记忆角度关照中国古典研究的诗史问题。参照西方记忆研究，他区分的“活记忆”和“死记忆”属于过去呈现的范畴，而非记忆力、记忆术的范畴。较之西方记忆理论，“活记忆”与“死记忆”以“对祖国的忆念”为区分原则，立足于中国书写传统，成型于“现在的需要”。以“活记忆”和“死记忆”为起点，钱锺书首创了记忆研究与中国文史传统结合的路径，并将中国文史研究纳入到记忆研究的国际话语体系。

关键词 钱锺书；“活记忆”；“死记忆”；记忆研究；文史传统

记忆研究是现代西方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一大宗。早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如弗洛伊德、伯格森、普鲁斯特等，认识到记忆对于理解人类活动的重要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涂尔干、哈布瓦赫、瓦尔堡等人认识到记忆的社会属性，提出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记忆概念。同一时期，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布洛赫等呼吁在历史研究中关注集体记忆，倡导研究社会结构与精神依凭，心性史研究一时风头无两。二战后，犹太大屠杀激起学界对记忆与历史呈现的持续关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再次将记忆研究推向高潮，影响直至现在。某一社会如何呈现其过去，过去的面相在研究实践中不断得以细化^①。然而，在理论层面，西方学界继哈布瓦赫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产生新说，其中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诺拉的“记忆之场”和德国伉俪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影响最为深远^②。现在，记忆转向也为中国学界所关注^③，诺拉和阿斯曼夫妇的研究论著近几年先后被译介引进^④。哈布瓦赫的遗作《集体记忆》一书更是早在2002年即有中译本问世^⑤。十几年间，记忆研究在中国颇有方兴未艾之势^⑥。然而，肇始于西方的记忆理论如何适用于中国语境，中国的记忆研究何以因时就势、推陈出新，仍有待学界中人花费一番功夫。就笔者目力所及，仅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一书

中颇有创见地提出“活记忆”与“死记忆”之说，从记忆角度观照中国古典研究的诗史问题。一个甲子过去了，他这一“新说”几未引起学界深思。故本文不揣冒昧，在下文中以“活记忆”与“死记忆”为对象，分析这一说法的内涵、前提和意义，以西方记忆理论为参照，讨论其适用性与学术价值。

一 区分记忆的原则：对祖国的忆念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的导言中说：“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但是它反映这些情况和表示这个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样。”^⑦结合宋诗实例，他指认了三种诗歌反映历史现实的方式。以范成大的《州桥》为例，钱锺书指出：“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这是另一种反映方式的例子。”^⑧依他之言，历史考据与文学创作各司其职，一个断定已然，一个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⑨。通过参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审慎地表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⑩。随即他提出“活记忆”与“死记忆”之说佐证这个观点：

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

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消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从韩元吉的记载里，看得出北方虽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里的人民还是怀念祖国。范成大的诗就是加强地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来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所以那样真挚感人。^①

具体来说，“对祖国的忆念”相对于忘掉了祖国而产生，忆念与忘掉的主体是“沦陷的人民”。呈现忆念与沦陷之事的主体是南宋使臣。比对诗歌和史书呈现的金国人民遭逢南宋使臣的场面，“生活的现实”经由历史“克己的美德”与文学“创造的职权”交相辉映^②：《州桥》中，遗民父老含泪当街追问来使，六军为何不恢复失地；史籍中，南宋使臣记下的却是失陷近五十年后，沦陷区人民多以外人视之的言谈，如“此中华佛国人也”“此宣和官员也”^③之类。根据韩元吉的记载，使臣“避嫌疑……一语不敢接……使亲故之从行者反复私焉，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④。可见，沦陷区或确有人暗中对宋庭充满怀念，然而在金国的“南京”，断没有人敢当街拦下使节、披露心迹、自认为宋人，这却是历史事实。如此，勾联在事实与心迹之间的忆念即由《州桥》中不合事实的“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景象呈现出来。以历史考据之法辨别诗中的景象，“沦陷的人民”如此忆念祖国有不实与夸大之处，不合情理，然而从文艺创作的视角考察诗歌呈现的现实，诗歌刻画的忆念真真切切地服务于爱国志士“激发家里人的爱国行动”，干净直截地表露了爱国之心，人情入理。因此，钱锺书坦言，“文艺作品的写实不就等于埋在琐碎的表面现象里”^⑤。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是他资以说明诗歌反映历史现实且比史书来得高明的基准。

围绕诗史关系，钱锺书除了在《宋诗选注》一书频频笔墨，更在《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屡

屡发声。他的言论历来为中国古典学者所关注^⑥，然而，学界对钱锺书诗史观念的分析多未顾及他的诗学理念，尤其是最早见于《谈艺录》的“史云乎哉，直诗（poiêsis）而已”一说^⑦。这里的“诗”他特别注为 poiêsis，此即希腊文“ποίησις”（“创作”）。“ποίησις”源于动词 ποιέω（“作”），同出于“作”的“ποίημα”（“作品”）为拉丁文以及不少欧洲现代语言所沿用，指称“诗”（poem-poème-poema etc.）。钱锺书疾言以史为诗之时避“ποίημα-poiêma”（诗—作品）不用而特意用“ποίησις-poiêsis”（诗—创作）作注解，意在驳斥“史必征实，诗可鉴空”之说^⑧，所针对者乃长期以来以诗为史的诗史传统。同样秉持“诗—创作”理念，他说“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⑨，指出“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⑩。综观钱锺书的诗史论述，如“‘诗史’成见，塞心梗腹”^⑪；“‘诗史’一门，尚扞格难通”^⑫；“‘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⑬。他所针对者无一例外都是“古无所谓诗，诗即记事之史”^⑭，及“以诗当史”“诗史”“六经皆史”之类^⑮，他从未否定诗歌能够反映历史现实。如他所言，文学作品扎根于作者的生活现实，履行“创造的职权”反映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但历史考据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⑯。因此，为辨析诗史关系，重振以诗为史的学术风气，钱锺书从记忆角度观照诗史研究，以触动情感与灵魂、激发爱国之心为准绳解说文学创作与历史考据的高下之别。

依钱锺书所言，“活记忆”依托于灵魂和情感，体现为对祖国的忆念，如同树木上的字，愈长愈牢，“死记忆”依托于理智，体现为生字、数目、事实等，如同石头上的字，终会模糊消灭。此处总揽“活记忆”与“死记忆”的记忆是过去的呈现，是刻在树木上、雕在石头上的“字”，而非记忆过去的能力——记忆力、记忆术，雕刻木、石的技能。表面上看，钱锺书将记忆二分，把生字、数目、事实等依托于理智的记忆称为“死记忆”，似乎在说记忆力，实际上却非如此：“死记忆”之“死”乃相对于情感、灵魂之“活”而言，换句话说，记忆鲜活的情感价值——“对祖国的忆念”是他此处区分记忆的原则。按照呈现“对祖国的忆念”与否，钱锺书将记忆分为“活记忆”

与“死记忆”两种类型，这一做法并不鲜见。且不说二元论普见于各类学科之中，单以记忆研究为例，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相对于“个人记忆”而来，阿斯曼夫妇将“集体记忆”二分，推出“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之说，“文化记忆”又被再次二分，化分为“热回忆”与“冷回忆”两类。可见，记忆研究区分记忆的关键不只在得出哪些类型，还在于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区分。事实上，正是从区分记忆的原则上，我们见到钱锺书的文化敏感与自觉。哈布瓦赫区分“集体记忆”是从社会构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入手。阿斯曼夫妇依托不同文化机制中口述传统与书面传统在“集体记忆”中担负的功能，将用于不同场合的“集体记忆”区分为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两种。

回头看钱锺书区分记忆的原则，他的着眼点落在文本呈现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他以字为记忆的象征，不论诗歌还是史书，均以文本为记忆的落脚点。字、文本都是书面文化的产物。扬·阿斯曼讨论古代中国的文化属性时，言语之间亦将中国社会作为书面文化的典型。不过相对于扬·阿斯曼对书面文化如何作用于日常生活、如何应用于不同场合的讨论，钱锺书对文本的口述特质、文体的表演场景并未过多关注。他注意到不同文体呈现历史和社会的侧重有显著差异：

宋代的五七言诗虽然真实反映了历史和社会，却没有全部反映出来。有许多情况宋诗里没有描叙，而由宋代其他文体来传真留影。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而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像保留在《宣和遗事》前集里那几节，所谓“见于街谈巷语”。^②

但是，他并未深究不同文体呈现过去的差异与文本的受众以及表演场合的关系，也未虑及用于不同场合的文本服务于塑造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他眼中，不论是诗歌、史书，还是小说、戏剧、乃至街谈巷语，都是我们研究过去不可或缺的材料，都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这是他浸润于中国文史传统的结果：中国文史研究一向倚重书面材料，学界习于综合研究不同文本承载的过去，将不同文体的文字记载彼此补充、互相参证。

因此，钱锺书的记忆研究立足于中国书面传

统，着意于书面文本对过去的呈现。不论“活记忆”还是“死记忆”，钱锺书都从文本的书面属性出发，对文本的受众、表演以及口述属性未曾多加留意。根据他的研究，区分记忆的关键在于文本呈现过去的情感价值——“对祖国的忆念”。具体考察“活记忆”反映历史与社会的真实时，钱锺书落脚于“活记忆”的情感真实。依他之言，文艺创作的情感真实不受岁月侵蚀，它会随时光流转而愈发深刻，而以理智为依托呈现的数目、事实等“死记忆”随岁月流逝为人所淡忘，难以真挚感人。话虽如此，他并不否定历史考据侧重的“死记忆”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文学研究是一门严密的学问，在掌握资料时需要精细的考据，但是这种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考据在文学研究里有了它应得的位置，自觉的、有思想性的考据逐渐增加，而自我放任的无关弘旨的考据逐渐减少……现在……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③

可见，钱锺书从记忆研究的视阈考察中国文史研究，意在说明历史考据不能喧宾夺主，不能机械用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④。参照“活记忆”考察诗歌、史书、小说、戏剧等如何写实且不埋没在琐碎的表面现象里，钱锺书对文学作品反映历史和社会真实性的讨论，不单指合于考据的理性真实，还强调怀念祖国的情感真实。如此，文艺作品呈现过去的真实性都在两个层面上存在，而不单单是为了构建唯一的、科学的历史真理。这一点决定了他对诗史关系的看法不同于深受西方现代历史科学、实证史学影响的现当代学者。

二 塑造记忆的条件：现在的需要

钱锺书《宋诗选注》出版30年后，曾发行港台版。在1988年1月撰写的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钱锺书曾这样开解自己何以保持旧作的原貌：

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引者注：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历史（引者注：史书）和回忆录等有许多随时应变而改

头换面的好范例。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②

这篇“前言”曾以《模糊的铜镜》为题刊于《人民日报》，圆括号中的文字现不见于附录在《宋诗选注》一书的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此处增补之，原因有二：一是佐证钱锺书区分历史与过去的自觉，辨析过去、现在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自觉；二是佐证学人将历史、史书与过去混等以“史”言之的现象钱锺书亦在所难免。早在1978年，钱锺书在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说中，曾发表类似言论：

近代一位意大利哲学家有句名言：“在真正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③

现在，我们都知道他说的这位意大利哲学家是谁，较之过去支配现在、现在支配过去之类，钱锺书此处论及现代中国的古典研究时，更强调研究者——“我们”的主体性，强调从过去的东西中发掘现实意义的研究需求。

更早些，1933年，在为西班牙学者加塞德《现代论衡》一书撰写的书评中，钱锺书这样写道：

我以为史学的难关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因为，说句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我以为历史上的事实也可分为两类：（一）野蛮的事实，（二）史家的事实。一切历史上的事实，拆开了单独看，都是野蛮的。到了史家手里，把这件事和旁的事实联系起来，于是这件事，有头有尾，是因是果，便成了史家的事实了。……加塞德教授主张要有 Metahistory……Metahistory 是极有趣的玩艺儿，虽然……对于实际工作的人，未必有大帮助，不过至少教我们知道历史的抽象意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免得有权威的学者动

不动便抬出“史学方法”来唬人。^④“Metahistory”40年后因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一书而为人所熟知。在西方，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19世纪将历史语文学扩展到一切历史研究之中，开创了历史科学，运用考据研究史料成为历史科学的前提和核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证主义风潮统治欧洲文学研究，根据钱锺书的说法，中国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美引进实证主义，将之与清代的“朴学”相配合，一时间使文学研究几成为考据的同义词，使考据几成为科学方法的同义词，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展开了“对实证主义的造反”^⑤。20世纪下半叶，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针对实证主义和历史科学开始辨析史书情节化与小说的相似性，试图突破文史体裁之别，讨论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鉴于不辨体裁的论学路数一向为中国文史研究所奉行，无怪乎，钱锺书直言 Metahistory 未必有大帮助。借这一论调，他立足中国文史传统，在二三十年代历史科学大行于世之际，申斥以“历史的抽象意义”之名动不动以“史学方法”来唬人的学术风气。

回头看钱锺书针对“史学的难关”发出的议论，他所谓“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从本质上否定了历史科学所宣称的唯一的、客观的、真实的历史观念。根据他的说法，因“现在的需要”，我们能把“将来理想化了”使其呈现不同的面貌，同样地，我们也能将“过去理想化了”使其呈现不同的面貌。换句话说，过去的面相时时刻刻都会根据我们现在的需要而变换。他进一步指出，史家处理原始材料（野蛮的事实）方式不同，于是过去的事实（史的事实）在不同史家笔下产生的意义不同，变为“史家的事实”。对“野蛮的事实”“史的事实”“史家的事实”进行区分，透露出他对历史主体的自觉和对接纳西方学术话语、应用西学研究理论的慎重。

85年前，在现在对将来的影响得到反思之时，钱锺书将话头转向过去，明确过去的事实亦会因现在的不同而产生多重意义，指出现在的需要会同时决定未来和过去的面相，强调“我们”“史家”对过去呈现的影响。在《宋诗选注》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一点：

诗人十之八九从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家

庭出身，经过科举保举，进身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在民族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有爱国的立场；在阶级矛盾问题上，他们可以反对苛政，怜悯穷民，希望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过假如人民受不了统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枪地对抗起来，文人学士们又觉得大势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后世的士大夫在咏梁山泊事件的诗里会说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板。北宋士大夫亲身感到阶级利益受了威胁，连这“公道话”似乎都不肯讲。直到南宋灭亡，遗老像龚开痛恨“乱臣贼子”的“祸流似海”，才想起宋江这种“盗贼之圣”来，仿佛为后世李贽等对《忠义水浒传》的看法开了先路。^③

显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眼中“梁山泊事件”呈现出不同面貌，文人学士对人民大众的态度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亦截然不同。从北宋到南宋，梁山泊众人的形象从“乱臣贼子”变为“盗贼之圣”，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现在的需要。究竟什么是现在的需要？又是什么决定了现在的需要？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显然首先需要确定主体是谁，基于哪个主体产生了现在的需要。在“梁山泊事件”中，记录、评论的主体是“诗人”“文人学士”“士大夫”“遗老”。不论使用何种文体，只要他们论述的主题关乎水浒中人，中国文史研究都不避讳，根据题材将各文本对梁山泊事件的评议纳入研究范围。诗歌、小说、话本的使用场合和体裁差异对过去呈现的限制和影响，诗人、遗老、士大夫的身份差异给过去呈现带来的主体偏向，一向不为研究者所看重，可见文人凭文本传承过去，研究者凭文本知悉前事的书面传统对中国文史研究的影响之深远。表面上看，不同时期的文人对梁山泊事件的评议有别，然而穿透表面、发掘内里，我们会看到，每一评议都服务于促成其时其地记述主体眼中的家国统一、社会安稳。这一内里贯通不同文体，不论诗歌还是史书，不论小说还是戏剧，文人在文本中呈现过去莫不以家国为尊。虽历史进程不同，文人、文本背后的趋向并无根本差异。

总之，20世纪上半叶，钱锺书对于“诗人”“文人学士”“士大夫”“遗老”“文人”“我们”等主体的自觉，使他指认历史、史书与过去的联

系，先声夺人地发出“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观点。以爱国之情兴发于情感和灵魂阐述诗文呈现过去的意义，钱锺书强调文史研究的情感价值之余，也从根本上重申了文史研究所应坚守的底线。以对“对祖国的忆念”为“活记忆”的体现，他意不在否定依托历史考据的“死记忆”，而是力图超越一时间以“科学”“真理”为唯一指向的研究风气。事实上，历史科学、实证史学在西方的兴盛源于19世纪的民族国家建构，所谓科学真理本质上亦服务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活记忆”与“死记忆”一说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西方学界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历史研究与民族主义渊源的探讨。

三 记忆研究与诗史关系：中西对话

从记忆角度关照过去呈现，有助于中西学术在体裁与题材之外另寻得一个学术对话的中点。诚然没有完美的理论，但只要学术研究的关照统一，各种实践总有互相生发之处。从同一研究视野出发，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研究实践也理应催生不同的理论参考，促进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20世纪90年代，德国学者格尔克在西方古代史研究领域首倡“意图史”的说法^④。他指出历史是群体自我认知的表述，一切关涉群体认同的记忆都可纳入“意图史”的研究范围。按照他这一理论，荷马是“（意图）史学之父”，希腊文化的一切文体，除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历史，都是意图史。格尔克提出意图史有两个理论根基，一个跟钱锺书一样，来自记忆研究，尤其是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理论，一个是民族社会学研究，尤其是“意图概念”^⑤。按他的说法，他将历史刨除在外是因为“尽管历史著述在某种程度上不免亦受意图史的影响，历史之父们的著作（还是）偏离了意图史，不是意图史的代表”^⑥。其实，与其说是历史之父的著作偏离意图史的框架，不如说是历史之父的身份、历史体裁的源起让他的研究视野受到束缚。在西方，学界超越体裁之别研究同类题材的不同文体如何呈现历史过去是相当晚近的事。从争论“历史戏剧”“历史挽歌”“历史诗歌”到提出“诗体历史”，西方学界最近十几年方才并置诗、史，聚焦诗歌这一文体如何

呈现过去³⁹。格尔克主动将历史剔出意图史的范围,足以让我们一瞥西方学术传统打破诗文体裁之别这一窠臼之难。

于钱锺书而言,体裁之分固然不曾给中国文史研究带来如许阻碍,但囿于题材不辨文体,执着于“诗史”之说乃至以历史考据为文学研究的指向,同样会给文史研究带来牵绊。提出“活记忆”与“死记忆”之说,钱锺书将中国诗史研究纳入记忆研究的范畴,其学术价值我们从参照诺拉的“记忆之场”考察诗歌另一种反映现实之处能得到进一步的展示。根据钱锺书的说法:

一首咏怀古迹的诗虽然跟直接感慨时事的诗两样,但是诗里的思想感情还会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标记,恰像一首咏物诗也可以诗中有人,因而可以帮助读者知人论世。⁴⁰

钱锺书注意到咏古、咏物都能“诗中有人”,“帮助读者知人论世”。可这些诗歌反映现实的方式虽有相似性,却仍有所区别。对这种区别,中国诗歌传统以“咏古诗”“咏物诗”的命名差异来体现。具体到钱锺书所举的几首诗,我们发现,每首诗都有世外桃源的意象,钱锺书根据不同诗人对同一意象的处理,分析出每首诗歌反映的历史背景。下文试以“记忆之场”解读、区分咏古诗和咏物诗如何诗中有人、何以知人论世,细分不同诗歌反映历史现实的异同,展示在记忆研究视阈下,不同学术理路处理诗史关系的异曲同工之妙。

按照诺拉的说法,“记忆之场”产生于我们意识到过去已成为过去的时刻,使残存的记忆得以保全、绵延的场所就是“记忆之场”。此即“记忆之场合”(les milieux de mémoire)消失,“记忆之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产生。“记忆之场”里的记忆不是自发产生,而是被妥善保存的。保存记忆的方式有很多,存档案、定仪式、办节日,举行悼念、勒石刻碑等。可是存放遗物、遗迹、存留过去的人、物不一定是“记忆之场”,只有当一事物,不论简单还是模糊、自然还是人为、具象还是抽象,同时具备具体性(matériel)、象征性(symbolique)和实效性(fonctionnel)三重属性才能被称为“记忆之场”。“记忆之场”有多种形态,具体某地只是众多形态之一。决定“记忆之场”的三重属性缺一不可,但在每个“记忆之

场”中,这三重属性可以分量不同,程度有别⁴¹。

此处咏怀古迹的诗,钱锺书以萧立之《送人之常德》为例,以注释中方回的逸诗作为参照。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渔夫误入桃源,见桃源中人与世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辞去后欲重寻却不得其门。以之为象征,萧立之在诗中恳劝道“请君停葛莫回船”,“山林黄尘三百尺,不用归来说消息”,感慨没有净土,期待世外桃源。如钱锺书所言,通读此诗,宋末元初之人意欲逃避异族统治的心理跃于眼前。乍看来,桃花源这个地方似是记忆之场,可是从记忆之场的三重属性分析来说,在具体性上,《送人之常德》这首诗是具象的,诗中描写的桃花源是抽象的;桃花源的象征性显而易见,诗歌的象征性则体现在诗人借劝渔夫不回尘世来赠别友人、借劝友人之常德抒发对元人的不满和期待逃离的情绪上;诗中的桃花源欠缺实效性,诗歌的实效性则体现在赠别上:《送人之常德》是为赠别而作。从“记忆之场”的三重属性论之,《送人之常德》这首咏史诗三重属性完备,堪为“记忆之场”论之,诗中的桃花源欠缺实效性,不足为“记忆之场”。

对于咏物诗,钱锺书以汪藻《桃源行》、邹浩《悼陈生》为例,说明世外桃源一类的意象因社会现象不同而被诗人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汪藻因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而做《桃源行》讽喻之,邹浩《悼陈生》之时宋徽宗尚未求仙问道,因此他只是感慨秦皇汉武欲求仙而不得、陈生巧遇仙人却不求。等到陆游遭逢国破家亡、朝廷偏安之时,桃源中人的避世之举,就如《桃源行》一般,激发诗人催生气节之叹⁴²。较之咏史诗,世外桃源的意象在咏物诗中随时势不同,激起诗人对时下的感叹,体现出实效性,而其在咏史诗中的象征性在咏物诗中消失不见。由此观之,世外桃源这一抽象意象在咏史、咏物两类诗中因不同诗人、不同人世而呈现不同面相。不同诗歌对世外桃源的关注不同,透漏出诗中有人、传达出不同的人情世态,成为激发后人对某时某地人情世态回忆的“记忆之场”。以“记忆之场”的属性分析世外桃源,其在咏古诗与咏物诗中具备的属性区别明显:咏史诗中的桃花源具备象征性,缺乏实效性;咏物诗中的世外桃源具备实效性,欠缺象征性。以咏物、咏史分别称呼这两类诗歌,中国诗歌传统

显然亦注意到不同诗歌对同一意象的使用之别。较之“记忆之场”的分析，两个传统观照诗歌反映现实的视角虽有不同，却终究殊途同归。

论及“记忆之场”，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对诗歌呈现“梁山泊”的简单勾勒，为我们再次体认从记忆研究视角考察诗史关系的学术意义提供了参证：

在北宋诗里出现的梁山泊只是宋江“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个风光明秀的地区，不像在元明以来的诗里是“好汉”们一度风云聚会的地盘。^⑫

随着水浒中人的活动，“梁山泊”这个地方被文人学士根据“现在的需要”呈现出不同面貌：从北宋的诗歌里的自然风光到元明诗里的风云际会，北宋、元明的文人对“梁山泊事件”的记忆偏向致使梁山泊呈现不同的面相。风光秀丽的梁山泊，因为水浒中人的风云际会，成为勾起人们回忆“好汉”“乱臣贼子”“盗贼之圣”的“记忆之场”。可见，不拘文体如何，诗歌、史书、小说、戏剧等都能呈现历史现实，承载历史记忆。依照历史科学方法追求唯一、客观的历史真实，追寻依托于理智的“死记忆”固有其现实意义，但不应因此偏废“活记忆”对于传承家国情怀的价值。考察“对祖国的忆念”这样的“活记忆”如何呈现于艺术作品，钱锺书借助记忆研究将中国传统学术纳入国际视野，促进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学术对话。

结 论

中国文史研究具有悠久传统，但近代以来的研究风气深受历史科学化的影响，追求历史真理长期以来被视为研究的天职。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对历史科学宣称的客观与真实不断反思，催生了许多新理论^⑬。中国学界亦对此关注不少，引介、借用西方理论是中国现当代学术活动的重要篇章。而就吸收、借鉴西方学术来说，钱锺书的工作为世所公认，可其精深隐微之处，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申发。如李泽厚所言：“大家对钱锺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⑭钱锺书固然博雅，但他博览群书，搜罗故实，远不止于罗列堆积。所谓

“电脑出现后，钱锺书的学问（意义）就减半了”^⑮，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他吸纳以创新为高的“西学”，落脚于以博雅为主的“东学”，以及申斥之、明辨之、慎思之的研究旨趣。

以记忆研究为例，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分辨“活记忆”与“死记忆”之时，虽未在此处参引西方论著，但翻拣钱锺书的其他作品——早出如《谈艺录》，晚出如《管锥编》，可以发现他与西方的记忆研究其实早有接触：弗洛伊德、伯格森、普鲁斯特、涂尔干、哈布瓦赫、布洛赫等记忆研究者赫然在列，近代西方最早论及记忆与记忆术的作品——维科的《新科学》也被他屡屡参引。以史学研究论之，他了解古希腊、罗马的史学传统^⑯，对近现代的西方史学理论亦了如指掌。除了广为国人接纳的实证史学，他对西方史学理论体认之广度和深度都不亚于同时代其他历史学者。不论是提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克罗齐，还是讨论“历史的观念”的科林伍德，抑或是提出“元史学”“形式的内容”的海登·怀特，他都曾资以参考，并以此反思中国传统，讨论一段时间为主流所不知、所排斥的研究理路。

历史科学的客观性、真实性让20世纪上半叶的不少中国学人重塑了“朴学”的历史价值，可对历史真实的执着使其忽略了蕴于中国史学传统的其他可能。最近几十年西方史学突破历史真实、突破文体限制，讨论形式与内容、论述情节与叙事，于西方传统而言，确有其开拓与创新之处，但于中国传统而言，了解西学的演变脉络，最大的意义在于放开自缚的手脚，重新发现传统固有的理路，赋予其以新的观照和生命。从这个立场审视钱锺书，我们会发现，钱锺书的创见蕴于博雅，亦出于博雅，且恰是其博雅遮蔽了后辈晚学心向往之而不达的创见。他提出的“活记忆”与“死记忆”之说，从记忆的角度考证诗史关系、文史关系，辨析诗文何以真实反映历史和社会，不陷于西方记忆研究的理路，不囿于一时学术风气的羁绊，既为中国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也体现了中西学术互动的真正价值所在。

^①Alon Confino, “History and Memory,” 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ume V*,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6 - 51.

- ②“记忆之场”研究始于1978—1981年间诺拉在法国社科高研院围绕“急速消逝的民族记忆”开办的研讨班，在《记忆之场》的导言“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场域问题”里，诺拉详细阐述了其理论背景与研究依据。“文化记忆”研究始于阿斯曼夫妇1984—1985年在柏林科学院进行的学术研究，著作分别为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与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 ③参见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 ④参阅[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另有[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冯亚琳等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陈新、彭刚编：《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 ⑤参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⑥如刘亚秋：《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社会》2018年第1期；王明珂：《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张俊华：《社会记忆研究的发展趋势之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等。
-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钱锺书：《宋诗选注》，“序”第3页，第3页，第3—4页，第4页，第4页，第4页，第323页，第323—324页，第323页，“序”第3页，第6页，第3页，第479页，第6—7页，第5页，第5—6页，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 ⑩如杨明：《钱锺书与诗史互证法》，《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3期；王水照、侯体健：《钱锺书宋诗研究对治学的启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等等。
-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钱锺书：《谈艺录》，第103页，第102页，第103页，第104页，第103页，第10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 ⑩⑪钱锺书：《管锥编》，第2159页，第27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写在人生的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179页，第179—180页，第178页，第17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 ⑩⑪引文括号里的文字据1988年3月24日刊于《人民日报》的原文《模糊的铜镜》增补。
- ⑩⑪钱锺书：《旁观者》，《写在人生的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第282—283页。
- ⑩⑪ Hans-Joachim Gehrke, “Myth, history,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ses of the past in ancient Greece and beyond, in N. Luraghi,” *The Historian’s Craft in the Age of Herodot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86 - 313.
- ⑩⑪ Hans-Joachim Gehrke, “Greek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in L. Foxhall et al. (eds.), *Intentional History: Spinning Time in Ancient Greece*, 2010, pp. 15 - 33, 25.
- ⑩⑪ François Hartog, “The Invention of History: The Pre - 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Homer to Herodotu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9, no. 3 (2000), pp. 384 - 395; Deborah Boedeker, “Early Greek Poetry as/and History,”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d. 5 (2011), pp. 122 - 147; Ewen L. Bowie, “Ancestors of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Greek Elegiac and Iambic Poetry?” in Nino Luraghi (ed.), *The Historian’s Craft in the Age of Herodot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5 - 66; David Sider, “The New Simonides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elegy”,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27, no. 3, 2006, pp. 327 - 346; John Marincola (ed.), *Greek Notions of the Past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Eras: History without Historian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 ⑩⑪ Pierre Nora, “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 in id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1997, pp. 23 - 43.
- ⑩⑪ Chris Lorenz, “History and Theory”,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5, 2011, pp. 13 - 35.
- ⑩⑪李泽厚：《哲学家只提供视角》，《李泽厚近年答问录2004至2006》，第138页，第138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 ⑩⑪张治对钱锺书征引的西方学术著作尤其是古典著作，进行了专门的统计和研究，见张治：《钱锺书学案》，《上海文化》2016年第12期；《钱锺书西学视野中的古希腊罗马经典》，《中国文学学报》第6辑（2015年12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吴子林